

1918:北洋政府武装大撤侨

十月革命一声炮响,在给中国带来崭新的主义之前,先带来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挑战: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,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,其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。

告急文电雪片般地从海参崴飞往北京。

此时中国得到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——北洋政府却焦头烂额,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,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。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,“黑暗、腐朽、反动”的北洋政府,也顶住各方压力,下令出兵西伯利亚武装护侨——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。

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,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,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。1918年,全世界都对刮目相看。

1 远东告急

来自圣彼得堡的革命巨浪,涌到太平洋海岸时,几乎只剩下了几朵小小的浪花。远东地区不足1万人的布尔什维克,并没有足够的号召力,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,在通过突然的军事政变占领了伊尔库茨克、海参崴(符拉迪沃斯托克)、伯利(哈巴罗夫斯克)、海兰泡(布拉戈维申斯克)等战略要地后,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被颠覆,布尔什维克依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游击战。

占据优势地位的是捍卫旧政权的白卫军,但也在走马灯般地替换着领袖和政权名称,“西伯利亚临时政府”、“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”、“全俄临时政府”、“全俄政府”,你方唱罢我登场,一片鼎沸。

此时,滞留在俄国境内的华侨,足有百万之众。他们之中,除了传统的商人、手艺人之外,还有数十万派遣到一战前线的华工。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远东之后,海参崴等地的局势也开始不安,暴动的消息一日数惊。当地华侨纷纷涌向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,“来馆呼吁,接踵而至”。在俄国方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局势控制的情况下,华侨团体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、黑龙江旅俄华侨会、伯力中华总商会、阿穆尔省华侨总会等,都紧急呼吁祖国派兵前来护侨。

海参崴中华总商会在给中国总领事馆的急函中,请求“即派军舰来崴保护,并遣陆战精兵,发往离崴接近之吉林省所属之图们江,及东宁县、虎林县、绥芬河四处预先驻扎,一旦有事,调遣较易。”

黑龙江旅俄华侨会在给大总统、国务总理和外交总长的急电中,呼吁“若不从速进兵保护,不念华侨受其涂炭,即中国权利亦将损失,黑河更有何立足之地?”

身在动乱灾区的中国外交官们,对华侨们呼吁祖国出兵给



中国驻俄部队指挥官林建章



中国军队进入海参崴,受到华侨的欢迎。

予理解和支持。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陆是元,在第一时间将海参崴的危机进展、华侨的艰难处境及热切盼望,急电传回北京,并建议“及早筹维,为未雨绸缪之计”。

2 “海容”出击

其实,当外交部收到海参崴总领事馆报告的第二天,就立即与海军部展开了磋商。此时,是1917年12月12日,距十月革命爆发仅35天,考虑到十月革命波及到远东的时差,北洋政府的行动可以说是非常及时、迅速的。

对于派遣军舰护侨,海军部毫无异议,认为理所当然,但是,“现时国内多事,军舰不敷分布”,爱莫能助,只能通过外交途径为华侨尽力提供救助。

海军部的婉拒,绝非推托搪塞,此时国内的确是多事之秋。这年7月,孙中山在广东联合西南军阀等,发动第一次“护法战争”。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北洋第一舰队,投奔了南方阵营,这导致政府手上能掌握的海军力量大为削弱。

更多的呼吁信涌向了北京。海参崴中华总商会、伯力中华商会等华侨社团相继到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馆请愿,1918年1月8日,陆是元总领事再次致电外交部,要求中央果断调集军舰护侨,“以慰华侨之恐慌”,“以壮华侨之胆”,并“派得力陆军驻扎东宁、虎林、图们江、绥芬河四处”,确保撤侨通道的畅通。

1月19日,外交部将海参崴总领事馆的电报提交国务会议审议。依然被南方动乱搅得一团混乱的北洋政府,同意了护侨之事。国务会议决定,由陆军部会同奉天、吉林两省,抽调陆军进驻图们江,保卫护侨。2月16日,国务会议又决定,由吉林督军调兵绥远,保护伯力华侨。但考虑到出兵入俄将引发复杂的国际问题,军队不得越境行动,主要目的就是保持撤侨通道的安全与畅通。

但是,这种隔靴搔痒的办法已经无法应付俄罗斯越来越恶化的局势。当时的国务院进行讨论后,终于在3月13日决定:派遣一艘军舰前赴海参崴护侨,由海军部负责落实。海军部在3月20

日指定了“海容”号巡洋舰担负这开天辟地的出国护侨任务。

“海容”号巡洋舰,是当时中国海军的主力军舰。甲午战争之后,清政府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了3艘军舰,排水量2950吨,分别命名为“海容”、“海筹”、“海琛”,军史上统称为“海容级巡洋舰”。3舰在1937年抗日战争中,均悲壮沉于江阴附近的长江航道,以堵塞日本海军的进攻之路。

中国派遣军舰赴俄护侨,激怒了日本。此时的日本,正致力于建立中日的共同防卫体系,以便攫取自己在“北满地区”(东北北部)的特权。中国的单独行动,大大打乱了日本签订《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》的计划。在日本的高压下,北洋政府一边尽力敷衍日本,另一边敦促“海容”号尽快成行,将生米煮成熟饭。4月9日,在日本的一再责难下,“海容”号驶离国内军港,4月16日在华侨们的欢呼声中,进入了海参崴港口。

此时的海参崴港口中,已经有了另一艘悬挂中国五色国旗的商船“飞鲸”号。“飞鲸”号属于国有企业“轮船招商局”,此次奉派前往海参崴撤离华侨。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动用民用交通工具从海外撤侨。早在确定了“海容”号巡洋舰赴俄的同时,中国外交部就要求交通部和东三省地方,紧急加派机车、商船,从陆海两路加快撤侨。“飞鲸”号于4月10日出发,先期到达了海参崴。

“海容”号巡洋舰抵达后,“飞鲸”号的撤侨工作得到了巨大的支持,当俄方禁止华侨们搬运两具棺木上船时,在外交交涉无效的情况下,“海容”号巡洋舰应总领事馆的要求,“派兵四十名,登岸排立”,在武力面前,俄方边检人员也只能退让,“始得将枢装运”。“海容”号巡洋舰抵达后的第三天(4月18日),“飞鲸”号就满载了1165名华侨,起锚返航烟台。

3 出兵远东

“海容”号巡洋舰进驻海参崴还不到一个月,“捷克军团”发动叛乱,远东局势更为混乱。捷克军团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,至少20多万华工滞留鄂木斯克和伊

尔库茨克,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。日军虽数次前来赈济灾民,却明确宣布华侨不在赈济范围,亦不可购买赈济粮。

同时,管理远东地区的“白卫军”高尔察克政府,为了备战,积极搜刮民间财富,而华侨,尤其是略为富裕的华侨,成为主要的盘剥对象。日本支持下的谢苗诺夫“白卫军”,仅在1919年元旦一天,就从查获的70多名华商身上,没收了高达665万卢布的巨额现金。

白俄政权之外,布尔什维克、日本军等,也纷纷印刷各自的纸币,强行兑换,令远东地区成为全球纸币币种最多、物价最为离谱的地区。加上各种政权强行征收高额税收,远东地区的华商被彻底地变成了“无产阶级”。而且,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任何保障,针对华人的烧杀奸淫不绝于耳。远东华侨们再度向祖国发出呼吁:出兵!出兵!

此时,协约国各国也在积极磋商出兵干涉俄国内战,日、美、英、法等逐渐形成了共识,而北洋政府也不甘落后,与协约国列强展开外交交涉,表示中国将随同出兵西伯利亚,“此次若协约各国公共出兵,我国对于参战应尽之义务,自应一致派遣一、二千人,并以保护领馆、侨商”。

8月3日,已经在海参崴的“海容”号驱逐舰舰长林建章,被任命为“代将”,负责驻俄部队的全权指挥。

8月22日,北洋政府正式发表出兵宣言,陆军第九师抽调了相当于2个团的总兵力,人数达4000人,包括步兵、骑兵、炮兵、工兵、辎重兵和机关枪部队,分6批陆续开进了西伯利亚,由团长宋焕章负责指挥。主要使命就是确保海参崴-双城子-绥芬河的撤侨通道。

中国军队的到来,大长了华侨的志气。驻俄部队不断派出小分队,应华侨的要求,前往执行拯救和保护任务。而在驻俄部队无法驻守的城市,华侨们开始成立自己的民兵组织“商团”,领事馆悄悄协助他们购置枪支弹药,增强自卫能力。

在驻俄部队的壮威下,在内战最为激烈的伊尔库茨克一线,

中国外交官员不畏艰险,从莫斯科和哈尔滨联系调运火车,全程护送,仅1918-1919年就抢运出3万名被困华工。

4 武装护权

尽管中国出兵的公开目的是援救“白俄”,但白俄对华人的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。

白卫军首领谢苗诺夫继续屠杀和抢劫华侨,1919年1月1日他“没收”了华商们665万卢布的高额现金后,7月份再度刷新此纪录,华商们1000多万卢布被“没收”。

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驻俄中国军队的枪杆子也不是摆设,在外交抗议的同时,他们并没有龟缩在“顾全大局”的乌龟壳里,而是勇敢地抗击,向敢来骚扰的“友邦”“白卫军”开火。同时,驻俄部队也分兵进驻伯力、双城子、海兰泡等地,武装护侨。

这其中,最大的一起“摩擦”事件,就是所谓的“庙街事件”,中国军队面对俄罗斯白卫军,以及日军,勇敢地用枪杆子捍卫自己。

此时的庙街,驻扎了俄罗斯的白卫军和日军,日军还有4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。平日里,白卫军与日军对这里的2000多华侨予取予夺,双方矛盾极深。

10月份,苏联红军开始攻打庙街,白卫军要求陈世英的舰队为他们协防,遭到陈世英的拒绝。不久,红军攻入庙街,白卫军撤离,红军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包围在日本领事馆内,但因为缺少重武器,难以攻克。这支红军部队纪律不错,对华侨并未骚扰。因此,当他们拜访陈世英,希望从中国舰队的炮艇上拆借几门大炮时,陈世英及各舰指挥官们经过会商,爽快地答应了。于是,“江亨”舰的1门边炮,“利川”舰的1门格林炮及一批炮弹,“借”给了红军。在中国大炮的帮助下,红军迅速攻占了日本领事馆,击毙日军数十人,俘获130余人。次年春天江面解冻,在此兵力单薄的红军主动撤离,撤离时指挥官下令将日军俘虏全部处决。日军卷土重来后,发现了“惨案现场”,并通过炮弹弹壳发现了中国军队支持红军的证据,恼羞成怒,派出军舰包围了中国舰队,并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抗议。

陈世英一面矢口否认,推卸得一千二净,一面积极备战,准备在庙街与日军决一死战。双方相持数月,在协约国各国的调停下,调查最后也无法证实中国军队协助了红军的进攻。中国军事法庭因此仅判处陈世英革职,“永不叙用”,而日军也无奈解除了对中国舰队的包围。“永不叙用”的陈世英后来悄悄更名为陈季良,依然在海军中供职,到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已经高居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中将指挥官,亲自指挥了抗击日本海军的江阴海空保卫战。至于下令处决日军俘虏的苏联红军指挥官,则在日苏两国就“庙街事件”谈判时,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处死刑。

据《中国经营报》

